

【哲学研究】

德性的失落与重构

倪 勇

(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 山东 淄博 255049)

【关键词】德性; 失落; 重构

【摘 要】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德性观各具特色, 并具有相通之处。当代西方社会面临着德性失落的危险, 当代中国社会也因社会制度之变革, 从而必须承担德性重建之任务, 其核心在于: 以现实生活为基础重构德性。

【中图分类号】B82-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6)06-0196-04

一、中国文化之德性观

什么是德性? 德性是什么? 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人, 会有不同甚至相反的回答。麦金太尔说不同德性观之间不可公度, 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 每一种德性观都有自己独特的话语系统, 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追求。但是, 不可公度性并不意味着不同正义观之间的绝然分裂。事实上, 无论差距有多大, 不同的德性观之间总有某些共同之处, 其历史更替也总有脉络可寻。

在中国文化中, “德”字在商代卜辞中已经出现, 与“循”和“直”相通, 意指“循天之道”。老子以道释德, 确实抓住了德的本质。循天之道, 顺道而行, 必然有所得。所以, “德”又与“得”相通, 意指“获得”或者“占有”。就结果而言, “得”之要旨在于获得了什么; 就条件而言, “得”之要旨在于如何去获得。条件是结果的逻辑前提, 因而“获得的方法”比“获得之物”更根本。“皇天无亲, 唯德是辅”^[1] (《僖公二十五年》), 只有“明德”、“敬德”, 才能够“受民受疆土”。至先秦时期, “德”具有了“内得于己, 外得于人”的涵义。《说文解字注》对此作了详尽的说明: “内得于己, 谓与心所自得也; 外得于人, 谓惠泽使人得之也”。至此, “德”的涵义清晰起来: 获得之物依然是目的, 但仅仅是第二位的, 因而退居边缘; 获得的能力和条件成为直接的目的, 成为关注的中心。所谓“内得于己”, 就是安顿好自己的灵魂, 修养好自己的品性, 从而增进获得的内在能力; 所谓“外得于人”, 就是处理好与他人的关系, 获得他人的认可与支持, 从而奠定获得的外部条件。

“性”, 从一般的意义上看, 是指万物之品质。荀子认为, “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 用今天的话说, 性即是本性。《中庸》说: “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性与天命、与道内在关联, 因而不是某种偶然的特征, 而是事物的本质属性。

中国传统文化重人事、轻物理, 儒家尤甚, 所以, 人之性在万物中脱颖而出成为关注的焦点, 以至于许慎《说文》认为: “性, 人之阳光, 性善者也, 从心, 生声”。

将德与性连用出自《中庸》: “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此处之德性意指人的自然秉性。这种自然秉性不仅是属人的, 而且带有道德的意蕴。孔子只是笼统地讲: “性相近也, 习相远也。”孟子言人性善, 荀子言人性恶, 其关注的焦点都是人的伦理品性。考虑到性善论是儒家的主流思想, 《中庸》所讲的德性必定包含着善的成分。郑玄说: “德性, 内行之称。在心为性, 施之为行。”^[2] 可见,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德性是一种善良的道德品质和行为模式。

二、西方文化之德性观

在古希腊, 德性一直是伦理学关注的核心。德性与道德具有同等的意义, 以至于二者在任何场合下互换而不会影响语句的意义。伦理学就是关于德性的科学。

古希腊伦理学, 诞生于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转化的过程之中, 兴盛于城邦的繁荣时期。其面临的课题有两个: 第一, 如何使昔日的氏族成员转变为合格的城邦公民? 第二, 如何建构理想的国家? 由于个人、国家、宇宙同构, 所以三者具有某种贯通: 人与社会同自然遵循同样的规律, 合乎自然, 就是合理。考虑到氏族遗俗对集体主义的强调, 城邦对于个人的先在性和制约性, 第一个问题显得更为重要。这就是德性在古希腊成为道德核心的根本原因。

希腊七贤十分重视德性, 例如, 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人物的本质特征在于拥有并践行某种德性。苏格拉底则认为, 德性即是知识。在苏格拉底看来, 人们只要认识到德性, 就一定会依德性而行, 因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依德性而行是理性的必然要求, 因为, 只有德性, 才能赋予人生意义和价值, 才能赐予人生幸福。人们所行非义的原因在于无知。应该

【收稿日期】2006-04-17

【作者简介】倪勇, 男, 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

指出的是,苏格拉底之知识不是某种关于自然的科学,也不是某种获取尘世利益的技术,而是关于人生的探索与研究。

柏拉图在两个方向上丰富了苏格拉底的理论:第一,将人生的目标归结为至善,并且将善提升至宇宙观的高度,从而明确地将个人、国家、宇宙同构化;第二,将灵魂分析为理性、意志和欲望,认为自然的法则要求理性借助意志驾驭欲望,进而提出:“德性就是心灵的秩序。”德性存在于灵魂之中。德性是理性、意志、欲望的和谐相处,和谐的根基在于自然法则。合乎自然法则的秩序即是和谐,即是德性,也就是通常所讲的正义。个人的德性是这样,国家的德性也是这样。

亚里士多德对德性作了相当宽泛的理解,使事物成为完美的特性或规定,亦即物的卓越品质,都可视为德性。具体到人,“德性就是使人成为善良,并获得其优秀成果的品质。”^[3]善良从而获得幸福是人生的终极目标,为达此目标必须具备某种卓越的品质,这些卓越的品质正是德性,因此,德性不是某种外在的东西,而是与人生目的、与善和幸福密切相关的内在品质。德性存在于灵魂。灵魂有两个部分:理性和非理性。与之相对应,德性也有两种: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所谓理智德性是指理性的优异品质,例如智慧、明智;所谓伦理德性是指非理性的卓越品质,例如慷慨、温良。伦理德性旨涉他人,通过理性对非理性的调控而生成。“伦理的德性在于把较低的灵魂成分或冲动提交给正确的理性支配。冲动必须有理性和洞察力来控制 and 支配。德性是后天获得的,但他的基础在于灵魂的先天性质,德性就是使冲动理性化。”^[4]因此,伦理德性是一种选择性的品质,是理性评价、选择、满足欲望而形成的品质。

斯多亚学派进一步强化了理性与德性的关联,认为德性就是对理性、自然法的认可和遵从。德性是灵魂的正常状态,这种状态不仅保证了生命整体的协调一致,从而使人们能够独立、自由地对待外在事物;而且保证了人与自然、人与世界、人与他人的同一。

在中世纪,道德的核心在于如何处理人与上帝的关系。人生的终极目的是通过尘世生活的磨练而获得进入天堂的门票,达此目标的关键则在于对上帝的信和爱,因此,德性是在人生旅途中克服罪恶、完善生活的品质和能力。德性的实质是对上帝的皈依,是对上帝戒命的遵从。对于德目及其内在关系,基督教哲学家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大相径庭,甚至相反。但是,从探究路向和逻辑结构看,他们的理论具有明显的共同之处:第一,将德性视为道德的核心;第二,将德性与共同体的利益和个人所担当的社会角色联系起来。麦金太尔将此称为德性伦理的传统。此传统在文艺复兴时中断。自由主义的情感伦理学成为近、现代的主流,德性被边缘化,规则成为核心。德性被理解为伦理规范的内在化,被视为服从正义规则的气质或情感。归根结底,德性是一种有助于人生成功的品质,一种功用性的品质。

麦金太尔努力接续德性伦理的传统:“第一,把德性看作是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的必需的品质;第二,把德性看作是有益于—整体生活的善的品质;第三,把德性与对人而言的善的

追求相联系;这个善的概念只有在一种继续存在的社会传统的范围内才可得阐释和才能拥有”^[5]。麦金太尔的实践概念与我们通常对实践的理解并不一致。麦金太尔赋予“实践”的意思是:“通过任何一种连贯的、复杂的、有着社会稳定的人类协作活动方式,在力图达到那些卓越的标准——这些标准既适合于某种特定的活动方式,也对这种活动方式具有部分决定性——的过程中,这种活动方式的内在利益就可获得,其结果是,与这种活动和追求不可分离的,为实现卓越的人的力量,以及人的目的和利益观念都系统地扩展了。”^[5]例如,在古代和中世纪世界,家庭、城市、民族等共同体的创造和维持。麦金太尔认为,实践会给人带来两种不同的利益:外在利益和内在利益。外在利益是通过实践所获得的权力、地位和金钱等,是对外物的占有;内在利益是某种实践活动所独具的“好”,具体表现为实践成果的卓越以及在实践过程中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提升。德性与实践的内在利益密切相关。

三、马克思主义之德性观

相互差异的德性观是否具有共同性?当然有!撇开争议,可以将人的德性恰当地理解为品质,这种品质存在于精神或灵魂之中,且具有道德的善良属性,因而总是表现为正价值。所谓德性就是人的高尚的道德品质,就是去恶为善的、相对稳定的心理结构和行为模式。如此理解抓住了德性的一般特征,但失之于空泛,因而需要进一步的说明,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式的说明。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就德性做专门的论述,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没有德性观。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去观察和分析,德性会是什么样子?

首先,德性的根据何在?或者说,德性来源于哪里?

马克思主义将社会划分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用物质关系说明思想关系。德性,作为一种高尚的道德品质,是一种精神存在,其根基在于社会的物质关系。恩格斯说:“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6]德性或者说道德品质与道德观念内在一致:有什么样的道德观念,就有什么样的德性;反之亦然。所以,同道德观念一样,德性观念来源于经济关系。经济关系的变化必然导致德性观的变化。世上没有永恒的、绝对的德性观,与此相关,德性从来都是具体的、历史的。

经济关系对德性的影响与制约表现在如下几点:第一,德性为人所必需,为什么?因为它切合人性及人类生活的需要。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人性及社会生活的需要应由经济关系来说明。所以,经济关系是才德性产生与发展的原动力。第二,经济关系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而社会生活为德性的形成提供了社会、文化的背景,所以,经济关系是德性最深厚的基础。经济关系影响德性的中介环节是利益。

德性最直接的前提是利益尤其是阶级利益。利益有很多种,以主体为尺度,可以将利益划分为个人利益、阶级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主体不同,利益追求也不

同。利益冲突是常态。哪种利益与道德最密切?因为,第一,道德的实质是对利益追求或者说欲望及其满足的调控,这种调控带有理性计算的特征:抑制伤害他人和共同体利益的欲望,最大限度地增进每个人的福利。第二,在各种群体之中,阶级之间的差别最大,阶级冲突最激烈。并且,在文明社会中,阶级是社会的基本骨架。所以,尽管每一种利益都与道德相关,但阶级利益决定道德的本质。“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6]阶级利益决定着道德的风貌。利益制约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决定着人们的行为及其方式,因而成为价值观的核心,成为道德之善的核心。道德之善是德性不可或缺的内在规定。没有道德善,无论多么卓越的品质都不可能成为德性。所以,德性只不过是利益尤其是阶级利益的道德表现。

其次,德性如何形成?

德性,作为相对稳定的心理结构和行为模式,有一个形成的过程。德性的形成以人性为基础。孟子、陆九渊、王阳明、柏拉图、笛卡尔等人认为,人性天生具有善端,德性的形成是善端之发扬光大;荀子、告子、洛克、霍布斯等人认为,人性并无善端,德性在后天教育和环境影响下形成。在性善论看来,德性之形成是一个“求放心”、“减负担”的过程,其关键在于去除恶欲的影响;在性恶论看来,德性之形成是一个道德规范内在化为道德良知的过程,其关键也是荡涤恶欲。所以,二者目的一致,不同的仅仅是修行的途径和方法。

马克思主义从两个角度说明人性:就与动物的区别而言,人性在于劳动;就与他人的区别而言,人的本质属性在于其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性的善恶,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是一个虚假的问题。人性是一种具体的、历史的存在,就其本然状态看,无所谓善或恶。因此,德性之形式有赖于后天的修养,是知、情、意、行等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其基础是社会实践。

四、当代道德危机与德性迷思

麦金太尔认为,当代西方社会面临着深刻的道德危机,其根源有两点:第一,在反封建的过程中,人摆脱了身份、等级、出身等制约,个人成为不具有先在规定性的自由的人。如此,个人与共同体的血肉联系被斩断了,人们丧失了对生活态度和幸福的共同理解。道德失去了客观的基础,其标准只能出于个人的主观偏爱。第二,自由主义理论家对个人主义的崇尚,必然损害道德的客观基础。首先,自由主义对权威的质疑,必然伤害道德原则的统一性。“道德行为者从传统道德的外在权威中解放出来的代价是,新的自律行为者的任何所谓的道德言辞都失去了全部权威性内容。”^[5]其次,自由主义以欲望和激情等等情感说明道德的基础,因而将道德争论变成了断言与断言的争吵。最后,自由主义高扬个人权利,必然导致道德的功利化和工具化。道德仅仅是协调人际关系、获取外在物质利益的工具。

自由主义者并不认可麦金太尔的批评。在他们看来,第一,缺乏统一的道德原则,不是现代社会特有的现象,而是所有社会的常态。第二,自由社会的弊病与自由主义理论并无必然的关系,自由主义并不维护自由社会的弊端,而是力图

克服之。第三,自由社会并非彻底的杂乱无章,自由社会道德的基准线是对自由的崇尚与高扬。第四,现代社会与德性伦理不相容,换言之,自由主义所倡导的规范伦理更适合现代社会。

撇开具体的争论,麦金太尔诘难的意义清晰可见:担当多种社会角色因而不得不服膺多种道德规则的个人,是否应该具有某种相对稳定、统一的德性?由独立追求各自目标的人组成的社会共同体,是否应该具有某种共同的利益?传统与现代是否应该具有统一性?人在追求外在功利的同时,是否应该顾及到人生的内在价值和追求?人生是否应该有目的?人生的目的是不是幸福?道德客观根基的坍塌,道德权威的失落,道德普遍性的丧失,是否意味着道德的危机?等等,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如此,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浮出水面:德性失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黑暗时代的来临。

当代中国之道德现状如何?是否幸免于道德危机?当代中国的道德理论有三个源头:马克思主义,西方近现代自由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与三个源头相联系,当代中国存在着三种道德观念。自由主义伦理学及其在当代所遭遇的困境,上文已述及。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倡导儒家德性伦理,这种伦理经过100多年欧风美雨的侵蚀,经过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批判,只剩下残篇断简。但是,作为一种传统,儒家伦理依然渗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儒家德性伦理本质上是社群主义,强调集体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此种取向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不谋而合,因而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念。儒家道德与马克思主义道德,逻辑进路不同,结论不同,但价值取向相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此是原因之一。

德性伦理以德性为核心,规范伦理围绕规则打转。马克思主义关注的焦点,既不是德性,也不是规则,而是更根本、更深刻的物质利益和经济关系。在此意义上,仅仅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道德观超越了德性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的对立。这不是说马克思主义不看重道德规则或德性;而是说,马克思主义将德性和道德规则统一于现实的经济关系。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的差别与对立依然存在,但不再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这种对立不仅被限定在一定的范围,而且在经济关系的基础上走向统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观念是经济关系的产物,是阶级利益的反映。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利益,因而也具有不同的道德观念。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是无产阶级利益的反映。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个人从属于阶级,阶级的状况决定着个人的处境。阶级解放是个人利益满足的前提条件,是个人人生价值得以实现的前提,所以,无产阶级的解放,进而全人类的解放,是无产者的人生使命,是无产者生活幸福的根源和保证。马克思主义道德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维护全人类的利益。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核心是集体主义。集体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道德,无论德性还是道德规则,都是集体利益的伦理学表达。个人的利益,个人的

幸福,个人的使命,与集体息息相关。

在社会主义改革中,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及价值取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改变了集体与个人关系的性质,损害了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道德理想的社会基础。道德理想依然故我,产生、维持这种道德理想的社会基础变化了。道德理想与其存在的根基相脱节,并且,社会主义改革越是深入,社会转型越是彻底,这种脱节越明显,越迅速。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道德观面临着危机,换言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倡导共产主义道德是否可行?在市场经济领域倡导“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否切合实际?道德理想当然应该高于现实生活,但是不能脱离现实生活。缺乏现实可能性的道德理想,无论其多么高尚,始终是没有价值的幽思玄想。

五、现代德性之重构

德性失落,不是说德性荡然无存了,而是说原有的德性日益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与现实生活脱节了。因此,德性重构的真实含义是重建德性与现实生活的和谐关系。

德性与现实生活的和谐关系如何建立?可能的办法有两种:改变现实生活或者重塑德性。人当然应该依照德性的指引去生活,换言之,现实生活应该接受德性的规范和制约;但是,从更深的层次看,现实生活是德性的根基。德性,归根结底,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是经济关系的反映。因此,救助德性与生活脱节的正确做法是改造德性以适应生活。

德性重构的途径在哪里?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我认为,基本思路有两条:规范伦理学的思路和德性伦理学的思路。在规范伦理学看来,德性仅仅是道德规范的内在化,因而新道德规范的确立是德性重构的逻辑前提。没有道德规范,就没有德性,所以德性重构的实质是道德规范的全新界说。德性重构从属于规范创新。这在某种程度上取消了德性重构的原创意义,或者说,德性重构转化为道德规范的创新。在德性伦理学看来,德性是道德的核心,道德规范从属于德性,因而德性的重构就是道德的重塑,就是德性伦理的重建。

按照麦金太尔的理解,具有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共同人生理想的共同体是德性伦理确立的社会条件;从人生使命、人生目的关照人,则是德性伦理确立的思维模式。西方德性伦理传统的中断,现代道德危机之根源,在于上述两个条件的缺失。因此,恢复德性赖以生存的条件是解救现代道德危机的不二法门。

德性伦理赖以生存的两个条件,现代中国都具备:一方面,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利益一致的共同体大量存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家庭、生产队、自然村、企业等等都是典型意义上的共同体;改革开放之后,大多数的家庭、国有企业等依然是这样的共同体。另一方面,作为主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人生观具有明显的目的论色彩。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生而具有解放人类的使命,与此相关,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成为无产者的人生目的。利益共同体的存在、人生目的论的思维路向并没有导致德性伦理学的再生,这是麦金太尔所始料不及的。

在当代,重建德性伦理是一件棘手的工作,因为传统意义上的利益共同体日渐消解。重建德性伦理的繁难,并不意味着道德普遍性的必然丧失,也不意味着德性的必然失落。因为,德性与德性伦理学不是一回事,德性并不必然依附于德性伦理学。如果说情感伦理学对德性的理解存在偏颇,如果说共产主义道德与当今生活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脱节,从而将德性危机显现出来,那么问题的核心不在于重建什么样的伦理学——德性伦理学或规范伦理学,而在于以现实生活为基础重构德性。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德性重构的基础,不是抽象的理性和目的,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社会地位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生活方式与德性具有某种必然的对应关系,每一个阶级,每一个阶层,都拥有与自己的生活方式相一致的德性。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们,拥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因而也会拥有不同的德性。但是,在同一时代、同一社会中,这些不同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必然具有某种共同点,与此相关,人们也应该具有某种共同的德性。这种共同的德性与阶级的德性不同,可以称之为社会的德性。阶级之德性凸现了社会的分裂和对抗,社会之德性则凸现了社会的统一与和谐,而造就和谐、维护稳定是德性最重要的功能。

探讨社会之德性,不能从个别阶层的生活方式出发,不能着眼于个别人的道德追求;相反,应该从生活的共同基础出发,应该着眼于整个社会的道德追求。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变革,某种道德品质要成为全社会崇尚的德性,必须满足如下条件:第一,该品质与现实生活的整体性、同一性、普遍性相关联,因而能够增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有可能被全体公民认可;第二,该品质有助于社会的发展,因而具有不容争议的合理性。

胡锦涛同志说“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在此有几个问题需要注意:第一,社会主义荣辱观不是某一个阶级或阶层的价值追求,而是全社会的行为规范,每个人都应该遵守,因而具有普遍适用性;第二,社会主义荣辱观包含着特定的道德规范,也蕴涵着特定的道德德性:热爱祖国,服务人民,崇尚科学,辛勤劳动,团结互助,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艰苦奋斗。

【参考文献】

- [1] 左传[M].
- [2] 孙治让. 周礼正义[M]. 北京:中华书局,1987.99.
- [3]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35.
- [4] [美] 弗兰克·梯利. 伦理学导论[M]. 何意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5] 麦金太尔. 德性之后[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343,237.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 133,134.

【责任编辑:杨晓伟】